



企业如何从“大”走向“伟大”，与会嘉宾表示 创新引领 走向世界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规模大重要还是创造价值重要？什么样的价值应该是企业优先考虑的？如何定义“伟大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如何迈向“伟大”……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经济从规模向质量转型，作为经济微观个体的中国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方向。

在今天下午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从‘大’到‘伟大’：企业的蜕变”分论坛上，嘉宾们指出，中国企业要通过创新能力证明自己，要勇于走出国内市场变成全球化的企业，通过创新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既要利润，也要社会担当

对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而言，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是否仍然是追求利润？面对这一问题，嘉宾们一致给出肯定的回答，表示盈利始终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常识不可否定。与此同时，嘉宾们也指出，企业发展应当把盈利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也是帮助自身成长。近年来，茅台酒业经营形势一派红火，贵州茅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透露，与此相伴的是，从“十二五”至今，茅台公司已经为国家贡献税收上千亿元，投入90亿元做公益事业，当前还在扶贫上做很多工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从‘大’到‘伟大’：企业的蜕变”分论坛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介绍，新希望集团配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用5年时间，义务培养10万名乡村技术人员。刘永好说，新希望集团创业36年仍然健在，而一批同期创业的企业已经消亡，重要的原因就在强调社会担当。“当你既考虑盈利又考虑责任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就不会让你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伟大的企业要引领创新

中国企业要从“大”迈向“伟大”，

但如何来定义“伟大”？嘉宾们表示，创新能力和对特定领域的贡献是重要考量标准。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说，创新尤为重要，它不仅仅是产品层面的创新，还要有管理形式和治理方式上的创新，跟周边社区关系的创新，促进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袁仁国也表示，伟大的企业既要规模大，也要有创新上的“大”。“治理模式一定要优化、一定要先进、一定要科学。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CEO 王中磊认为，伟大的企业要扮演创新引领的角色。他以迪斯尼公司为例表示，“他们不断的改变和引领经营模式，甚至运用金融的方式进行并购，把所有的企业整合在一起，我觉得他们非常先进，迪斯尼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

刘永好则从企业的贡献层面来进行衡量，指出伟大的企业要在特定的领域做出的贡献特别大，例如创新科技引领发展，解决环保问题，解决贫困问题，等等。王中磊也表示，往后判断伟大的企业的标准或

许是，能否通过创新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如果有企业的生物科学上的创新能使人类免受疾病困扰，这就是伟大的企业。”

“伟大的公司都是受人尊敬的公司，”刘永好表示，“公司伟不伟大，自己说了不算，要让别人、社会来讲，要让时间检验。”

伟大的中国企业要走向全球

中国企业如何迈向“伟大”？普罗迪认为，具备全球眼光非常关键。他说，在国家内部抓住机遇做大的企业还算不上伟大，要长成伟大的公司，需要持续进步，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不只关注国内市场，还要关注全球市场，走向世界。

普罗迪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任何公司想成为全球性的公司一定要来中国；而中国的公司想要变得更加现代，也必须要到欧美变成非常活跃。如果大家都想在全球化上取得成功，就要走向协同合作，共谋成功。

袁仁国也表示，世界眼光对于伟大的企业来说是首要的，在此之后，还要有开拓、创新、冒险、不屈不挠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他还强调，不可忽视文化因素，文化自信非常重要，企业只有具备文化自信才可以做长久，因为品牌背后是文化。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各界嘉宾齐聚博鳌热议技术革命推动社会发展

新一轮技术革命需要兴利去弊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你期待哪些技术革命？哪些行业最需要技术革命？什么样的技术进步、突破与革命，才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可持续的繁荣？

近年来，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专门设置了一场主题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分论坛。今天下午，与会嘉宾围绕大家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共同分析、畅想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人们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改变。

“回看历史，那些强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都是由于技术革命的推动而实现的。”论坛一开始，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就表达了他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期待。

各行各业都需要技术革命

所谓技术革命，就是要解决当下

社会面临的问题。“各行各业都需要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百度总裁张亚勤认为，未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就是AI人工智能技术，搜索引擎和云计算一旦用上人工智能技术，将改变整个互联网行业。此外金融、健康医疗、教育等行业中凡是运用到数据的部分，也会使用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也认为医药行业、卫生行业必须进行技术革命，因为这是基于人类需求要进行的技术革命，人类能从技术革命中获得更多。“我们做过统计，当前全世界需要约4000万卫生保健人员，发展中国家需要1800万卫生护理人员，这个领域的技术革命可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努力让人们有尊严地接受护理。”

浪潮集团是一家大型计算机企业，该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认为，总的来说，技术革命可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技术革命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二是技术革命带来的

智慧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三是技术革命为实体经济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人们在从事技术研发的同时，新技术也在推动社会进步，催生新业态。”

技术革命是把双刃剑

未来，人类研发的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科技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已然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好奇和畅想的画面。

“未来人工智能这一颠覆性的技术也将应用到无人驾驶、新零售等领域，当然，这些还要花一些时间。”张亚勤说。

专注于社交软件领域的以色列ICO 投资人约恩·伯迪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未来，交通、电力、机械工作等各个行业都会有机器来帮忙，就连人的大脑乃至整个神经系统也会得到人工智能的加强。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会帮助人类思考，人类的智慧也将达到我们从未想象过的程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兰西

斯·格利博士认为高端制造业将会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获得很大收益，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制造业也不会需要太多劳动成本，这对全世界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以智能化的搜索引擎为例，它会记住用户的使用习惯，并有选择地推动一些信息，我们的认知系统便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约恩·伯迪认为，我们不可否认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两面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人类的价值系统，正确地开发和使用新技术。他有些担忧，每一个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技术革命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是社会的两极化，富裕的人获得收益更快更富足，而很大一部分人也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

技术革新也要全球化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全球关注，也成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阻碍人类新

一轮的技术革命”自然成为不少“技术控”关心的话题。

“中国货物贸易早期多是物品和货品，再到资本，现在到了能力和技术出口的时代。”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技术革新领域没有任何的赢家，技术革新也要全球化，任何经济体之间都不应该有贸易战，这对任何一方都不利，而技术的变革能够让人们更好地协作和前进，打破贸易壁垒，中国目前的技术、人才、市场发展势头良好。

当前，许多贸易战与专利相关，在推动先进技术革命共同向前发展的同时，技术革新领域的专利保护也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陈冯富珍介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愿意联合起来，在健康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贸易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共促新一轮技术革命向前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报博鳌4月9日电）

与会嘉宾激辩未来生产

抢占发展先机 唯有主动拥抱变革创新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20年后的工厂与今天有怎样的不同？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在多大程度上对人工和就业构成挑战？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解决失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将要如何应对？饱受高人工成本困扰的发达国家，能否因此重振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机遇在哪里？

今天上午在博鳌举行的议题为“未来的生产”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上述话题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拥抱人工智能是大势所趋

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变革的一部分来自于技术领域的颠覆，技术颠覆核心的部分是制造业本身的变革，而改变制造业的动力来自于各个方面，包括AI（人工智能）、机器人等。

“世界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必须适应新时代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而这些变化有一些好的地方，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挑战。”默克高性能材料全球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阿伦·嘉伯说，“麦肯锡有一份报告预测，将有400万到800万人可能会在2030年失去工作岗位。类似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制药企业，抑或是特种材料企业，或者是特种生命制品企业身上，而且人们已经看到一些非常清晰的征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新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拥抱人工智能，尽快提升自身的数据分析能力，把我们的劳动力技能从简单的体力劳动过渡到学习一些更高级的技能，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未来属于敢于创新的人和企业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认为，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格力是典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来临，企业深刻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认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大变革时代到来并未让我们感到恐慌，而是更应该感到骄傲。对传统制造业来讲，目前最大的难点是选择人才培养的路径发生了变化，过去工人们只要老老实实把螺钉打扎实了就行，在今天则需要尽可能发挥自身创造力，因为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阿伦·嘉伯透露，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创新中心，并且把企业最新的创新成果拿到中国落地。“我们三个创新的业务都位于中国，一个是特种材料，即平板制造，还有制药以及生命科学，而且我们相关的研发机构都支持将创新成果在中国落地。”

“在过去，格力电器8万人每年创造的产值达800亿元左右，现在我们也是8万人，但是研发队伍占了1万人左右，产值则达到了1500亿元。”董明珠说，“一个企业的发展并不是简单

地用自动化替代过去的人工以后，就进行减员，而在于创造社会价值。”

与会嘉宾认为，未来属于那些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人和企业。

最大的发展机遇在中国

这是变革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好的创业创新时代。

“今天对于所有的年轻人来讲都是很好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过去我们几十年很难出世界级企业，这是由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未来包括现在，我们陆续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也是由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小米机器人创始人、董事长袁辉认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要在历史洪流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说对于在海外有很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来说，中国是非常好的舞台，因为这里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有很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而且这里有巨

大的正在变革的这样一种机会。”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创业和创新的时期，因为我们国家在拥抱这些新科技方面不落后来于任何国家，比如美国在AI领域的投入占全球40%，我们则占30%。还有很多行业可能因为新一轮放松管制而产生一系列增长的机会。”对于未来中国发展，董明珠充满期待。“刚刚我和其他嘉宾讨论的不少国际标准都来自于德国、美国，来自中国的目前还没有，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心胸，不是因为我们的过去落后就甘于落后，不因为你过去先进，未来就一定要先进。我认为全世界都要携手同行。”她说。

嘉宾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极大的机遇，世界也迎来了新的“中国机遇”。在大变革时代，谁主动拥抱变革，谁主动拥抱创新，谁就能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本报博鳌4月9日电）

与会嘉宾共同探讨 农村与农民的转型

乡村振兴离不开 资本投入与人才

■ 本报记者 孙慧

每一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都会有一到两场分论坛讨论“三农”议题，从每年的讨论议题中也可看出时下“三农”领域最关注的热点，更折射出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变迁。

今年也不例外，4月9日上午，一场主题为“转型中的农村与农民”的分论坛在博鳌举行，来自亚洲地区不同国家的农业部门政府官员、研究“三农”的学者与农业企业家共同探讨，农村与农民如何应对转型带来的挑战。

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城市群；另一方面，是逐步空心化的乡村。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副部长金炯洪称，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化发展中，都会面临着城乡发展差距的矛盾。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面临着城乡发展差距矛盾，从事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务农人口严重老龄化，壮年群体在务农人群中仅占1%左右，农民群体收入是城市群体收入的64%，农业人口劳动力流失非常严重。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介绍，中国正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仍然还有四五亿人口生活在农村。

2017年，中国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理念。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韩长赋说。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场的嘉宾也提出了建议或分享经验。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加强对农村金融资本投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会上宣称，未来五年内，新希望集团要在全中国培训10万个家庭农场主和乡村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和成长。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韩长赋称，根据政府部门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现在已经有超过700万人到农村创新创业，从事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农村电子商务等。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金融专家详解资本外流风险： 中国债务安全可控 唱空中国没有依据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博鳌亚洲论坛将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11个国家定义为“E11”（新兴11国），在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发展中，应对货币政策紧缩和总体债务攀升的风险是一门必修课。

“这个老话题有了新因素，我们要用新方式研究新问题。”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与债务风险”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世界资金流动都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流动的，这是老话题；而“新”在于，过去都是新兴经济体负债、发达经济体借钱，而这次发达经济体也负债，而且负债非常高。

近几年，李扬的团队研究发现，观察资本流动债务积累对一个国家是不是造成伤害，关键看那个国家储蓄和投资的对比关系，也就是把存量和流量放在一起观察，“流量”要看储蓄投资，“存量”要看资产负债。“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很高，那么资本流动的风险就可控。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只要国内储蓄率跟不上，就一定发生危机。”

面对大家担忧的中国债务和高杠杆率问题，李扬明确答复，“外汇储备的流动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不大，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的，而不是通过资本项目获得。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虽然居民杠杆率偏高，但仍在比较安全的范围内，唱空中国没有依据。”

“目前中国的债务结构当中，居民负债虽上升较快，但仍处于安全范围；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十分健康；地方政府存在一些债务问题，正在逐步处置，到去年第四季度，地方债务增长已经出现持平。”李扬分析，企业债务又分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两部分，从整体看，企业杠杆率在去年末略有下降，其中民营企业下降很快，但国企杠杆率还在上升。（本报博鳌4月9日电）

